



BLANK:
ESSAYS ON
LITERATURE
AND CULTURE
TIAN XIAOFEI



留白

秋水堂文化随笔

田晓菲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留白

秋水堂文化随笔

田晓菲 著

BLANK:
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

TIAN XIAOFEI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留白：秋水堂文化随笔 / 田晓菲著. — 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9.6
ISBN 978-7-5598-1770-9
I. ①留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88674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

网址：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责任编辑：罗丹妮

特约编辑：张旖旎 田南山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：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

开本：1230mm×880mm 1/32

印张：9.5 字数：200千字

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6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1 代前言 幽暗的树林
- 辑 一
- 9 从红楼到绮楼
- 17 留白
写在《秋水堂论金瓶梅》之外
- 29 “田”与“园”之间的张力
关于《牡丹亭·劝农》
- 64 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重新发明
- 94 大跃侧诗话
- 123 半把剪刀的锐锋
重论郁达夫

辑 二

- 135 瓶中之舟
金庸笔下的想象中国
- 184 鹿与鼎
金庸，香港通俗文化，与中国的（后）现代性
- 232 走向我们已在的地方
《少林足球》、《大话西游》及其他
- 242 对镜
赋得艾柯近作《鲍多雷诺》
- 253 关于《弗里达》
- 258 十日谈
- 279 代后记 秋声赋与爱莲说
- 285 再版后记 权力的经济

代前言

幽暗的树林

“在三十五岁那一年，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幽暗的树林里。”但丁的《神曲》，是这样开头的。但丁的向导是前辈诗人维吉尔；但丁的旅程，是对阅读的象征。维吉尔引导但丁，只能到炼狱为止，不能进入天堂，因为阅读是凡人的事。阅读总是在直线前进的时间里进行。时间的概念，是构成历史的要素；而只有人类才有历史，天堂是永恒不变的。

八九岁的时候，读希腊神话，留下很深的印象，因为看到神的局限，英雄的悲剧；又正是在这局限与悲剧里，展现了他们的力。

吴楚材、吴调侯的《古文观止》，是我的古汉语入门教材之一。记得最喜欢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的选段，不为别的，单只是欣赏里面的辞令；那么悠扬委婉，却又绝不肯委屈。

蔡东藩从两汉到民国的历史演义，也是那时爱读的，虽

然直到多年后，才意识到，其实所有的历史，都不过是演义而已；叙述的方式和角度，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，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。

大学时读的书很杂，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，其中包括《世界史》、《圣经》。每个文明，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，了解世界和人类多一点，对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好处。《圣经》则好比一座宝库，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。我喜欢的章节有《约伯记》和《雅歌》。约伯是忠厚好人，却无缘无故遭到厄运，在他对上天的号诉里，我们听到人对自身命运的质问，对信仰的质问。《雅歌》是我所读过的最美的情诗之一，写爱人“美好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”，写爱情“如死之强大，嫉妒如阴间之残忍，众水不能淹灭，大水也不能息”。

少年时看书，在书中看到的总是自己；年长后，才逐渐开始真正听到他人的声音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少年时读的书，也往往很容易被它们影响和淹没；成年以后读书，则好像平等的朋友，可以互相尊重，也更容易在这样的关系里得到乐趣。

二十八岁那年，发现了曾经弃之如敝屣的《金瓶梅》。这真是一部世界罕见的奇书。我特别钟情于绣像本：它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读者，也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小说中人。爱读《金瓶梅》，不是因为作者给我们看到人生的黑暗——要

想看人生的黑暗，生活就是了，何必读小说呢——而是为了被包容进作者的慈悲。慈悲不是怜悯；怜悯来自优越感，慈悲是看到了书中人物的人性，由此产生的广大的同情。

《论语》是一部少有耐看的书。千百年后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，仍然如闻其声，如在目前。孔子让弟子“各言其志”，在众弟子中，孔子独独赞同曾点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这在以治国平天下著称的儒家来说，是让人惊讶的回答，但其实也许正该这样：别的弟子，只会想到自己可以“做”什么，“成就”什么；只有曾点，能够想象自己“成为”什么，“是”谁。

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社会，我一直有强烈的兴趣。这几年读得最勤的，恐怕是逯钦立编辑的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，清人严可均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所谓的“二史九书”，以及《大藏经》和《道藏》里与这一时期相关的材料。读这些书的最大体会是：文本细读，应该有泛读作基础；文学史背后，应该有文化史和社会史作支柱。否则，总难免是片面的。

一系列关于欧洲手抄本文化的著作，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。简单说来，手抄本文化与印刷文化最本质的区别，在于前者的流动性，从抄写者到编辑到读者（这些身份往往是并存的），都参与了抄本的制作和——更重要的——创作。我认识到传统的考证如何可以被提升到理论的层次，

从而获得一种新的生命，与当代世界接轨。对文本多重性的认识，只能发生于后现代文化之中。

近年来读的杂书里，印象格外深刻的有迈克尔·塞尔斯 (Michael Sells) 译注的古典阿拉伯诗歌，《沙漠之痕》(*Desert Tracings*) 和《欲望的驿站》(*Stations of Desire*)。古典阿拉伯诗歌似乎较其他古典文学都更不容易翻译，看过许多英文译本，都觉得不成其为诗。塞尔斯本人是学者，也是诗人，他的译文，是我见过的阿拉伯诗歌译文里最出色的。

谈到阿拉伯古典文学，不能不提到伊赞·哈赞 (Ibn Hazm)，中世纪西班牙伟大的学者和诗人，苏轼的同时代人。几年前，我在写《赭城》一书的时候，读了他的著作《鸽子的颈环》(*The Ring of the Dove*)。哈赞于公元 994 年出生在西班牙南部柯尔多巴的一个贵族家庭。他的少年时期是无忧无虑的：他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和他交游的也都是柯尔多巴的贵公子。后来，哈赞的父亲因政治原因被投入监狱，并于 1012 年去世。次年，北非的柏柏尔军队入侵柯尔多巴，哈赞开始流亡。他死于 1064 年 8 月 15 日。

《鸽子的颈环》写于 1027 年。这是一部奇异的著作。它描述了爱情的各个方面：它的性质，表征，源起，过程，直到它的终结。我们看到这样的章节：“关于一见钟情”，“关于眼语”，“关于进谗者”，“关于离别”，“关于憔悴”，“关于遗忘”。在这些篇章当中，哈赞对爱情的描述，既有个人体验，

也穿插了亲朋好友的经历和传闻。总之，这部书，是给爱情的献礼，也是对逝水年华的追忆。哈赞让我想到庾信，想到张岱，也想到《东京梦华录》的作者。也许，正因为这部书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忆，即使在表达强烈情感的时候，它的文字也还是具有一种优美而宁静的力量，就好像柯尔多巴开在十二月的素馨花，散发着寒冷馥郁的芬芳。

下面是《鸽子的颈环》中，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：

有一天，齐亚德·伊贵·阿比·苏扶严问他的大臣：“谁的生活是最快乐、最幸福的？”

“信徒们的领袖。”大臣们回答。

“但是，库拉什给他带来的烦恼和不幸，又该怎么说呢？”

“那么，就是陛下您自己了。”大臣们说。

“但是，”齐亚德继续发问，“卡拉基人给我找的麻烦，还有帝国的边疆给我带来的忧虑，又该怎么说呢？”

“尊敬的陛下，那么照您看来，谁才是天下最快乐、最幸福的人呢？”

他答道：“一个善良的人，娶了一个善良的妻子，两个人不愁吃穿，他满足于她，她也满足于他；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。”

故事最后的话，让人想到中国古代的《击壤歌》。天下大治，百姓无事，田间老父击壤而歌，观者叹息道：“大哉帝德！”老父回答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于我何有哉！”

一个普通人，满足于自己的生活，不觉得这和君王的统治有什么相干。假如统治是成功的，那么，这也正是应当出现的情形吧。

秋水

记于波士顿寓所，时年三十五岁

辑
一

从红楼到绮楼

宋代诗人陈与义（1090—1138）写过这样一首诗：

杨柳招人不待媒，蜻蜓近马忽相猜。
如何得与凉风约，不共尘沙一并来。¹

貌似简单的一首绝句，带来很多问题。诗人道中所见，想必远远不止杨柳、蜻蜓、凉风、尘沙，为什么单单挑选出这几个意象？杨柳与蜻蜓，又和诗人对凉风的祈愿有什么相干？这种愿望本身——不携带尘沙的凉风——暗示了什么？这些问题不仅牵涉到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古诗，也牵涉到一种在近现代格外流行的文化思想模式。

1 陈与义：《中牟道中》其二

我们首先注意到，杨柳和蜻蜓，本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，在诗中却构成了反差。杨柳招人；蜻蜓本来飞近，却突然相猜而避开了。这也许是因为杨柳本是无情之物，既然无情，也就全无机心；蜻蜓之所以猜疑，令人想到《列子》里面关于海鸥的寓言。海鸥原本和人亲密无间，一旦人产生了机心，海鸥也就再不肯落下了。在这首诗中，正是诗人自己的机心，造成了大自然的异化：杨柳的牵缠，从杨柳来说是无心的，从诗人方面来看，却好像是在有意招惹，而且因为“不待媒”之故，是一种不合适甚至不合法的举动，出界的挑逗。诗人这样的多心——把人类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自然界——造成了蜻蜓的远离。

然而，在杨柳 / 蜻蜓和凉风 / 尘沙之间，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联。是什么使得诗人发出这样情感强烈的祈求——“如何得与凉风约，不共尘沙一并来”？诗人没有告诉我们。这首诗的评论者，也从来对此避而不谈。也许，是因为评论者都以为这首诗是“写实”的，换句话说，凉风和尘沙是诗人对“现实世界”的反映，无须作出更多的解释。但是，诗的世界不是现实的世界，因为，如前所言，现实世界的中牟道中，应该充满了各种各样可以观看的景象，为什么偏要谈到杨柳、蜻蜓、凉风与尘沙呢？从蜻蜓到凉风的转折，又该如何解说呢？

在这首诗里，凉风与尘沙构成一对互相对立的概念，这种对立不是平等的，而是具有等级性的差异。尘沙扑面，是

凉风造成的，因此，尘沙是第二性的，是果；凉风是第一性的，是因。在概念的层次，因比果具有更大的重要性；同时，在价值的层次，凉风舒适而尘沙肮脏，因此，凉风的价值也大于尘沙。这样的价值判断，基于所谓的常识。但是，问题又来了：谁的常识？我们意识到，这一“常识”其实代表了人/诗人的价值观念，不是杨柳的或者蜻蜓的，更不是凉风的或者尘沙的。诗人在作出区别，这种区别不仅仅发生在认识论层次上（凉风不同于尘沙），更发生在价值判断层次上（凉风好而尘沙不好）。这把我们带回到老子、庄子与列子的哲学领域：世界的堕落，正是由具有等级差异的分别造成的。我们回头看到，凉风吹起杨柳，柳枝拂面，令诗人感到懊恼，发出“招人不得媒”的埋怨；而就在诗人用一己的和人类的道德观念来看待自然界的时候，蜻蜓已经感知到了诗人的机心而倏然远离。但诗人依然不悟，渴望凉风可以“不共尘沙一并来”，没有想到却是这样的渴望，使世界变得不再完美。

中国阅读传统喜欢把一篇作品置于叙事语境。陈与义是在服孝期满前往都城任职的路上：“京洛多风尘，素衣化为缁。”评论家们又很少提到《中牟道中》两首绝句里面的第一首：“雨意欲成还未成，归云却作伴人行。依然坏郭中牟县，千尺浮屠管送迎。”佛寺与坏郭，向行人展示无常和虚空。“尘”是佛教的概念，然而六尘者不存在于外，它们不过是人的六

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感觉和认识的六种境界而已。也许竟不是京洛多风尘，而是诗人太在意风与尘的分别了。

陈与义的绝句标志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时刻。它表现的是一种洁癖，一种对于“纯粹”的追求。据十二世纪的笔记《道山清话》记载，北宋邵尧夫曾说过一段话，颇有意思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人会好洁成病，邵尧夫答道：“胸中滞碍而多疑耳，未有人天生如此也。初因多疑，积渐而日深，此亦未为害。但疑心既重，则万境皆错，最是害道第一事，不可不知也。”邵尧夫的话固然没有错，但就连这样具有自觉的议论也是相当“宋人”的。宋代文化不从改朝换代的十世纪开始，而从十一世纪开始；陈与义的诗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语境中更可以看出它的代表性来。

风是风，尘是尘，原是不可能相融，也不自然的。然而，这样的二元对立到了近代，却演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思想模式。近代小说《红楼梦》一个最重要的主题，就是清洁与腌臢的二元对立。大观园是一个封闭的系统，里面住的都是“极尊贵极清静”的女儿们。这种洁净，常常反映在非常具体、非常物质的层面。譬如说宝玉烫了脸，起了一溜燎泡，不肯叫黛玉瞧，因为知其“好洁”。妙玉洁癖尤甚，不但不肯再用刘姥姥吃过茶的杯子，而且人走了，还要宝玉的小厮打水洗地：“只是你嘱咐他们，抬了水，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，别进门来。”尤三姐对宝玉的一番观察极为细致入微：